

贬谪流放文人在民族文化发展中的贡献

李伟

(宜宾学院,四川 宜宾 644000)

摘 要 贬谪流放文人的独特身份和地位,使他们到了贬谪之地后,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才干,通过倡导教化、开馆授徒,改造陋习、移风易俗,化解民族矛盾、促进民族团结,交游问学、发掘地域文化,诗赋山水游记风土人情、促进文化交流等方式,用自己悲壮的人生为民族文化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关键词 贬谪 流放文人 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 G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7)01-0082-04

传统文化熏陶下的文人士大夫,在遭遇屈辱的贬谪流放的时候,内心是痛苦悲凉的,但文人特有的精神气质和骨气使他们很快从个人的遭遇中解脱出来,积极主动地投身到所处的社会生活之中,把中原文明的阳光洒播到当时尚未开化的蒙昧之地,改造和完善了地域文化,加速了各民族的融合,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

一、倡导教化 开馆授徒 启迪民智 培育人才

有官职的贬流文人利用职位大力倡导教化,开办学校,普及教育,改变了当地没有学校、文化教育落后的面貌。韩愈被贬阳山、潮州时,大力兴办学校,化民成俗、培育人才。当时潮州不仅乡校废而不兴,州、县学亦如此,韩愈就写了一篇《潮州请置乡校牒》,着力兴办学校。为解决师资问题,“韩愈聘当时的进士赵德以摄海阳县蔚、州衙推官的身份,‘专勾当州学,以督生徒’^{[1]204}”;为解决办学资金问题,韩愈“出己俸钱百千(十万)兴办学”^{[1]204},效果显著,“时潮之学者,翕然奋兴,以进士明经贡于朝廷者,岁有其人”^[2],后人的评价是“自昌黎教行,而民始知有制度、读书”^[3]。刘禹锡在元和十四年被贬连州刺史时,“在任重视地方文化建设,积极扶持后进,连州文化教育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发展极快,登科第人数之多,仅次于韶州人居岭南各洲前列”^{[4]597-598}。柳宗元贬柳州,首先做的就是提倡儒教,修孔子庙,兴办学校,使“人去其陋,而本于儒,孝父事君,言及礼仪”^{[5]140},提升当地百姓的文化水平。《柳州县志·艺文》说:“自柳侯守是邦,建学官,崇圣教,稍稍诱以经

书,悟以文章,由是钝根既凿,灵钥顿开,历宋元以至于今,鸿儒硕生后先相望。”

没有职位的贬流文人,则直接开馆授徒,这一点对当地的文化教育作出的贡献尤其显著。三国的虞翻,“徙交州,虽处放罪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6]43}。唐代翰林学士张昢贬封州司马,“封民语不可解,昢时教以文,渐知诗书”^[7]。太子校书王义方被贬海南昌江,见其“蛮俗荒梗”文化落后,便“召首领,稍选生徒,为开陈经书,行释奠礼”^[8]。柳宗元在柳州“亲自为师授徒,培养了不少人才,‘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9]。苏轼贬儋州,以桄榔庵为讲堂,开馆讲学,教化民众,使当地“书声琅琅,弦歌四起”。贬流名相李光、胡铨也“开设学堂,推进儒学教化,对本地区的文化教育产生较大影响。尤其是胡铨在崖州,‘日以训传经书为事’,向当地学徒讲解《周易》、《春秋》、《周礼》”^[10]。杨慎谪戍云南,在大理的感通寺教授生徒,“慎数游感通寺,寓写韵楼,读书著述和教授生徒”^[11],“一时问字者,肩摩山麓”^[11]。御史高公韶被贬谪到云南富民典史,在县“置馆延师,教其子弟,风俗为之一变”^[12],被祀当地名宦。清朝被贬流东北的洪皓曾在晒干的桦树皮上默写出《四书》,教村人子弟,张邵甚至在流放地开讲《大易》,“听者毕集”^[13]。

这些教育措施和活动使当地的教育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逐步发展壮大,开启了民智,并培养了大批人才,同时极大地激发和改变了当地百姓学习文化知识和致仕的社会风气。

二、改造陋习 破除迷信 移风易俗 造福民众

历朝统治者选择被贬谪之地都是当时还处于蒙昧、尚未开化的边缘之地。如秦汉时的西北边疆、岭南 隋唐江南西道的南部瘴疠之地 宋代的海南、雷州半岛 明清的东北和新疆之地。这些地方都处中原文明之外,有很多的陈规陋习,贬谪知识分子则采取了很多改造陋俗的措施,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

柳宗元贬柳州发现当地有“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的残酷风习,于是“按国之故,以佣除本,悉夺归之”^[14],将那些已经沦为奴婢的人,按服役期限计算报酬,当报酬和债款相当时,就自动解除奴役关系,恢复人身自由。此举让上千人恢复了自由 柳州民众原来吃江水,汲水艰难,而当地人又迷信,不敢破土打井,柳宗元就用公款雇工打井,破除了这种封建迷信^{[5]142},针对“柳州人生病,不懂得求医问药,只知请巫祭神,为此他在百姓中提倡医学,推广验方”^[15]。韩愈贬潮州、袁州时,当地同样有穷人因为家计而买卖奴隶盛行,于是他“不暴民物,掠卖之口,计庸免之,未见计直,辄与钱赎。及还,着之赦令”^{[1]199},而“袁州之俗,男女隶于人者,逾约则没入出钱之家。愈致,设法赎其所没男女,归其父母,仍削去其俗法,不许隶人”^[16]。其余张万福在魏州、韦丹在容州、李德裕在剑南都解决过类似“以口为祸”的奴隶问题。成化时刑部员外郎林俊被贬姚州,鹤庆玄化寺以菩萨显灵感众,林俊不信如侵犯泥佛会招致冰雹损稼之说,下令将其焚毁,“得金数百缗,悉输之官,代民尝逋”,接着又“毁边方淫寺三百六十余区”^[17],民间代代传颂。苏轼在儋州时,看到当地因巫医猖獗而形成的杀牛风气盛行,便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一文给琼州大和尚道斌,“使以晓喻乡人之有知者”,希望改变这种悲剧性习俗,因为牛是农业生产中最重要动力和生产工具,而“黎人得牛,皆以祭鬼,无脱者”;对这种愚昧的做法,苏轼揭穿了巫医骗人的迷信把戏;海南黎族有“坐男使女”的土风,即男子在家闲居而女子出外操劳,苏轼就把杜甫在夔州写的类似的情景诗篇《负薪行》讲给当地黎民听,希望改变这种落后的现象^[18];看到大量的良田沃土被荒废,就劝说百姓克服游手好闲的陋习,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幸福生活“斩艾蓬,南东其亩”“春无遗勤,秋有厚翼”“霜降稻实,千箱一轨。大作尔社,一醉醇美”^[6]。天顺年间贬流永平主簿郭本,“拓县治,绥流夷”^[12]。这些措施都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落后风俗和社会面貌,对当时和后世的社会风气的影响至为深远。

三、化解民族矛盾 促进民族融合

贬流之地远离中原文化、远离内地,属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由于统治阶级的原因,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时有矛盾冲突发生。贬流文人与“蛮夷”们朝夕相处,使他们能够客观、公正的认识和对待少数民族,这对扭转汉民族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化解民族矛盾具有积极和深远的意义。在发生冲突时,贬流文人则主动奔走其间,积极斡旋,尽可能和平解决。

柳州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柳宗元充分“尊重少数民族人的生活习俗,较少古代一般知识分子的华夷偏见。写当地少数民族生活情景,豪没有鄙薄和猎奇的色彩,表现出深切的了解和同情,他是较早关注西南民族问题的人之一”^{[5]138-139}。刘禹锡贬连州,也与当地少数民族莫瑶族相处融洽。在《莫瑶歌》中对莫瑶族人民在艰苦条件下顽强生活的坚毅精神,表示敬佩,在《连州腊日观莫瑶猎西山》诗中,极大地赞扬了莫瑶族猎民在一次大规模狩猎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高度的智能和严密的组织性,对被历代统治者诬蔑为南蛮之人的莫瑶族深为关心了解,没有歧视^[19]。与少数民族相处最为融洽的当数苏轼在儋州,在《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诗中,认为“华夷两搏合,醉笑一杯同”,在和陶潜的《劝农诗》中更明白表示“咨尔汉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训,夫岂其真?怨忿劫质,寻戈相因,欺谩莫诉,曲自我人。”主张华夷融合、汉黎平等,反对轻视少数民族,并认为发生纠纷时,过错应是汉人。在当时的传统氛围中,他这种各民族平等相处的思想是非常可贵的。洪武年间,程本立贬流马龙他郎甸长官司吏目,恰好逢麓川思可伐煽动百夷叛乱,他立即“单骑入其寨,以顺逆利害喻之,诸夷落咸感悦”,事件很快平息下来。不久,叛乱又起,程本立复受命掌县内兵事,负责抚御,奔走于楚雄、姚安、丽江等地,“往来绥辑凡九年,民夷安业”^[20]。对于难以和平解决者,则重在打击为首者,胁从不究,尽量少株及百姓。天顺年间刘文以通政贬流临安,时有“土人石虎倡乱”,官兵屯久不敢进,刘文独率数骑夜冲其寨,擒其首领,余者降服。后召复职,临走时,“老稚遮留,繁资涕夷,依依不忍去”^[12]。林则徐贬流新疆时,道光皇帝欲将原先回民开垦的十万亩荒地收回“招致户民承种……原非为该处回户另筹生计”^[21]。如果施行这一政策,将直接导致民族冲突的发生。林则徐看到这个不符合实际而且危险的政策,不顾“戴罪之身”,力劝朝廷收回成命,“在事关边疆安危、民族团结是大非问题上,敢于挺身而出力陈,犯颜抗争,正是林则徐的坚持,才使清政府允许所请。在为民族团结与巩固边

防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22]。

贬谪文人的这些措施和举动,极大地增进和改善了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相互了解、相互认识,有利于加速推进了民族大团结局面的形成。

四、交游问学 发掘地域文化 形成新的文风和文学式样

交游,是贬流文人为解脱苦闷彷徨而采用的一种方式,具体表现为巡山踏水、游观饮酌、弹琴赏乐等活动。因地域文化差异所带来差异,使他们在相互交流中激发对文学、对现实的重新认识。而贬谪地的特殊地域文化给贬谪士人带来的影响尤其显著。如王运涛先生所言“不同的地理景观给诗人不同的创作灵感与素材,对地方而言,文人的流动对当地的文风带来影响^[23]”。通过整合地域文化,从而带来了文章风格的变化和文学式样的极大勃兴。

从题材上看,历史上著名的诗,大都在贬谪期间创作。屈原最伟大的作品《离骚》、《九章》、《九歌》都写于贬谪期内。柳宗元的《柳河东集》中,贬永州十年,所作诗文 400 多篇,凡脍炙人口、重要的作品,绝大多数作于此。白居易被贬江州后,《长恨歌》、《琵琶行》糅合了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审视以及个人身世的感伤,成为文学史上不朽的名篇。苏轼流放黄州,作词近 70 首,文学创作进入全盛时期,创作个性更加成熟,正如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所评“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山川之方至”。黄庭坚先后贬涪州、黔州、宜州后与前期的生新瘦硬相比,逐渐剥落浮华,进入了平淡质朴的境界。

发掘地域文化,把原来的知识经验和地域文化结合起来,往往形成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典型如屈原“将北方人的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二为一^[24]”,以“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手段,将南方的怪异神话、荆巫精神以及民间祭歌形式,融于一炉,创作了独具特色的“楚辞体”。刘禹锡则对巴楚、吴越民歌的成功借鉴而作《潇湘神》、《竹枝词》、《杨柳枝词》等,吟咏风俗获得巨大成功,遂使竹枝词成为后世文人吟咏风俗的专用体裁。苏轼则创豪放词,元白开文人以词唱和的新风。柳宗元以《三戒》的寓言体及《永州八记》山水游记体等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艺术宝库^[25]。

地域文化对贬谪文人的影响,是通过诗人自身对自己原有文学创作式样的改变而实现的。如柳宗元,古人有文人创作得“江山之助”的说法^[26],而乔亿在《剑溪说诗》中认为“永、柳山水孤峻,欲永嘉、陇蜀各别,故子厚诗文,不必谢之森秀,杜之险壮,自然独造”。梁德林先生则认为广西对柳宗元文学创

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柳氏文学的题材变化、意象变化、语言变化和文章风格的变化,“与其所处的地域本土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29]”。没有放逐,就没有《离骚》、《九歌》、《九章》,就没有屈原;没有永州十年,就没有《永州八记》,就没有柳宗元;没有贬谪黄州,就没有前、后《赤壁赋》、《赤壁怀古》,就不可能有名垂千古的东坡居士。因为贬谪,使地域文化与中原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扩大了文学的式样,也为华夏文化增添了更加绚丽的色彩。

五、著书立说 描写山水习俗 促进文化交流

当传统文人突然遭遇贬谪流放这个命运打击的时候,他们适时调整自己的心态和目标,从悲愤和屈辱中走出来,不能“立功”“立德”就转向“立言”;或著书立说,把以往史册文典中很少涉及的角落作为自己进行文化考察的对象,留诸文字,形成著作;或诗赋山水,描述民风民俗,至今仍为进行地域文化研究的专家们所钟爱。

宋代山西人刘寅谪戍今齿期间,利用自己精于文学、医道,写出了《伤寒脉赋》、《缠幽赋注》。苏轼在黄州完成《易传》、《论语说》,在海南完成《书传》。刘禹锡贬连州四年,写下了 80 多篇诗文,成为研究连州的宝贵历史资料^{[4] 597-598}。杨慎终身被贬云南,不甘为天地之蠹,埋头著述,对山川形势、风土人情、自然物产统统录而集之,成《滇载记》、《滇候记》、《滇产记》、《滇程记》、《滇中记》,成为研究西南史地的重要参考文献。洪武时贬臣王景常和程本立写出了《云南志》,为明代云南第二部省志。顺治十五年刑部右侍郎董国祥,贬俱流尚阳堡(今辽宁铁岭),主持纂修的康熙本《铁岭县志》,开创了东北编修县志之先河,是研究清初铁岭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极为难得的史料^[27]。清朝流放到黑龙江的系列文人如张缙彦所著《宁古塔山水记》、杨宾所著《柳边纪略》、方拱干所著《宁古塔志》、英和所著《龙沙物产咏》、吴振臣所著《宁古塔纪略》等,这些著作都具有极高的地理学、历史学、风俗学、物产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是研究整个东北的历史不可多得的史料^[13]。

贬谪文人的山水游记,歌赋词曲,则把当地“待在深闺无人识”奇异民俗风情、幽美原始的自然景观推介到外地。如后来闻名于世的苏舜钦之《沧浪亭》、柳宗元之《小石潭》、欧阳修之《醉翁亭》、苏东坡之《喜雨亭》,他们凭借良好的文字功底和各种极具哲理的思考,通过对历史的追溯和还原现场的方式,描绘出一幅幅美丽动人的自然、风俗画卷,帮助世人更深刻地认识某地的景观,重建景地的凝聚力和文

人胥文相在《柳祠录序》中谈到柳宗元对广西山水的影响“凡山川风俗,悉经记述,而亦寓焉,遂因以名天下,传后世,至于今日。人知有兹土者,以侯之文也”。而阳山也是“天下因昌黎,而始知有阳山”^[3]。其他如永州离不开《永州八记》,滁州离不开《醉翁亭记》,苏州离不开范仲淹的《苏州十咏》等,通过贬谪流放文人的生花妙笔,当地常见的平淡的人文景观、文化名胜与古屋遗迹才真正成为普通民众真实的日常生活中的背景,成为当地后世魅力无限、辐射四方的地域名片。

这些著作或诗赋把中原文化与贬谪之地的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客观上把地域文化传播到中原,促进了内地和边陲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贬流文人之所以能在民族文化发展中作出如此大的贡献,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他们本身都是当时的大知识分子、知名的大学者,占有资源优势;其二,受传统文化中不能“悬壶济世”、不能“立功、立德”就转向“立言”的影响,尽管身处逆境,但仍然以自己的理想和热情去对当地的文化发展作出个人的努力;其三,知识分子的良心所致,即居“江湖之远,而心系百姓”,在朝忧国,在野忧民的知识分子的骨气;其四,贬谪地百姓和地方官员的厚待。尽管是“戴罪之身”,但因为他们大都是被人排挤和陷害所致,因而百姓和地方官员都很尊重他们,包括送子女去求教、当地的士子主动和他们交游等。

同时,贬流文人与执政的文人在文化发展中的贡献也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一是贬流文人是用自己的亲身实践去传播文化,而执政文人则是通过管理和制度去传播文化;二是贬流文人是从微观、局部的角度对文化加以整合、传播,而执政文人则是从宏观、整体的角度对文化加以制度化的建设;三是贬流文人的贡献主要集中在文化、教育等精神领域对当地的传播和促进,而执政文人则主要是从政治、经济的领域加以影响;四是贬流文人把中原文化和少数民族的文化与习俗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整个华夏文明更加的包容和丰富多彩,而执政文人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主要是一种管束、灌输而缺乏融合、交流。

贬谪流放是对文明和文化的一种摧残。被流放者用生命和血的代价传播和创造了文化,但任何文化的传播都不能用这种非文明的方式进行。我们发掘他们在文化和文明的传播中的贡献是对专制制度

的一种记录和控诉,也是对历史上的所有贬谪流放文人最好的纪念。

参考文献:

- [1] 卞孝萱,张清华,阎琦.韩愈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2]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C]//文语·赵进士文.
- [3] 陆向荣.阳山县志[M]//朱汝珍.阳山县志.1936(民国二十七年).
- [4] 方志钦,蒋祖缘.广东通史古代上册[M].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 [5] 孙昌武.柳宗元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6] 周伟民.流放者的心路历程——苏轼在海南[J].海南: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2):43,40.
- [7] 道光.肇庆府志[M].卷十七·谪臣一.
- [8]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王义方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9] 梁德林.柳宗元与广西文化的双向影响[J].广西民族研究,2004(4):83,84-85.
- [10] 关万维.琼州文化[M].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18.
- [11] 丰家骅.杨慎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94.
- [12] 刘文微.滇志(卷十一)[C]//天后·官师志·郡县宦贤.
- [13] 蓝十一.宁古塔——流人的文化与生活[DB/OL]. [2004-12-30]. <http://lanyilanyi.blogchina.com>.
- [14] 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C]//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柳州罗池庙碑.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 [15] 刘泽民.山西通史·卷三·下编·专论[M].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625.
- [16]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韩愈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7] 刘文微.滇志·卷十[C]//天后·官师志·总部宦贤.
- [18] 蒲友俊.超越困境——苏轼在海南[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2):77.
- [19] 卞孝萱,卞敏.刘禹锡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78.
- [20] 张廷玉.明史·程本立列传·乾隆本[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1] 清实录·宣宗成皇帝实录·第417卷[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7382.
- [22] 林庆元.林则徐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169.
- [23] 王运涛.略论贬官士人的特殊心态及其文学表现[J].沈阳大学学报,2004(5):81-85.
- [24] 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C]//王国维遗书·第5卷·静庵文集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25] 向志柱.生命与文学的突围——论贬谪情结对文学创作得影响[J].江汉论坛,2001(7):88.
- [26]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M].
- [27] 铁岭市委宣传部.铁岭与流放文人[N/OL]. [2003-07-11]. <http://www.nen.com.cn>.